

赫魯曉夫政權下的俄羅斯正教

黃國維

(一) 引言

求你賜我們一顆平靜、無懼、平安的心去面對你的旨意。赦免我們，祝福我們，因我們是強盜，是撒馬利亞人，是小孩，是被打傷的人，也是那在旁邊繞路而過的祭師。那些行刑的、受害的、咒詛人的、被咒詛的、逼迫你的、愛你並俯伏在你面前的，他們都是我們的鄰舍。聖潔公義的父啊，請把我們全都接到你面前！

這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，在蘇聯的基督徒中祕密流傳的一篇禱文，¹ 記錄了當時在赫魯曉夫（Nikita Khrushchev）領導的共產政權下（1957-64），被逼迫的基督徒之心聲。以下一些歷史片段，可讓我們更了解他們面

1 Olivier Clément, "Martyrs and Confessors," *Ecumenical Review* 52, no. 3 (July 2000): 345.

對的逼迫：

因宣揚反蘇維埃思想，製作叛亂刊物，領導地下教派，危害他人安全，布格提里夫（Bogatyrev）被判入勞改營七年，皮里維士真（Perevishin）被判入勞改營五年。因參與地下教派，提供居所作聚會用途，卡林（Karlin）被判入勞改營三年。他們都是地下俄羅斯正教教派（Union of True Orthodox Christians）的信徒。審判結果刊於1964年2月29日的《東方真理》（*Truth of the East*）。²

國家主控官指奧思馬（Osma）夫婦每週日帶孩子路德、伊恩尼斯和彼德寧斯參加瘋狂的宗教聚會，損害他們的身心發展。人民法院判奧思馬夫婦被褫奪父母權利，孩子被迫和父母分離，到國家的寄宿學校生活。夫婦二人是五旬節地下教會的會友。審判結果刊於1964年2月8日的《哈薩克斯坦真理報》（*Kazakhstanskaia Pravda*）³。

1961年的法令禁止信徒到修院望彌撒。一個居於波奇輔（Pochaev）修院附近的女信徒經常到修院參加彌撒，一天，警察闖入她的居所，經過一輪性侵犯後，把她拉到屋

2 Richard Wurmbbrand, *The Soviet Saints* (London: Hodder & Stoughton, 1968), 103-4.

3 同上書，頁102-3。

頂上再推下去。後來鄰居在地上發現她，送她入醫院，但她在數小時後死亡。⁴

鄰近基輔（Kiev）的達尼思雅（Darnitia）鎮，1963年7月5日。挖土機白天在某座教堂旁邊挖了一個大地洞，晚上，教堂被炸毀，瓦礫被推進地洞中，以泥土覆蓋好。翌日，信徒前來教堂祈禱，被眼前的景象嚇壞了：他們的教堂在一夜間變成花草叢生的平地。⁵

所有俄國的宗教都於1917-91年間，在共產政權的統治下經歷到嚴峻的逼迫。在這七十多年中，有數段時期迫害最嚴重，赫魯曉夫執政的那幾年（1957-64）便是其中一段。本文以俄羅斯正教為中心，⁶簡述在赫魯曉夫掌政期間的教會歷史。筆者會從政府的策略、教牧的領導及信徒的回應幾方面，看看這段時期一些重要事件背後的因由，並作出反省。

（二）歷史

1917年的十月革命帶給俄國教會前所未有的挑戰。這「前所未有」是名副其實的，因為在這之前的基督教歷史中，從未有過教會在無神論的政權下生存。蘇維埃的共產

4 Dimitry Pospelovsky, *The Russian Church Under the Soviet Regime, 1917-1982* (Crestwood, NY: St. Vladimir's Seminary Press, 1984), 2:344-45.

5 Nikita Struve, "Five Years of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Russia," *St. Vladimir's Seminary Quarterly* 8, no. 4 (1964): 221.

6 本文的「教會」指俄羅斯的正教。

主義是激進的無神主義，單是政教分離不能滿足他們，他們還要摧毀一切宗教。革命後不久，列寧便著手實行這理想。他禁止教會辦學或推行社區工作，沒收教會財產，教會再也不能宣揚其宗教信仰，所有教牧均須向政府登記，一舉一動更受祕密警察監視。在斯大林執政的二、三十年代，大量教會、修院、神學院被迫關閉，眾多神職人員及信徒被判入監獄或勞改營，很多人不是被殺害，就是因獄中環境惡劣而死亡。⁷1941年的官方數字顯示，在1917年革命前，全國有47,457所教會、50,960位神甫及130位主教。經過二、三十年代的逼迫後，在1940年只餘下4,225所教會、5,665位神甫及28位主教，反映教會的力量被削弱至只有原來的十分之一左右。從1918年至三十年代末，約有42,000位神職人員被殺。⁸

二次世界大戰給教會一個喘息的機會。一方面斯大林忙於對付希特勒，需要教會支持對抗外敵；另一方面，在那些被德軍短暫佔領的地區，一些新教會乘機建立起來。戰後蘇俄從德國手中佔領了波羅的海的三國，發覺可以利用正教使她們歸順在蘇聯政權下。⁹加上斯大林和教會的關係好轉，因此由戰後直至斯大林去世這段期間，教會是有機會增長的。¹⁰

1953年斯大林去世，導致共黨內部發生權力鬥爭；1957年，赫魯曉夫終於擊敗他的對手馬蘭可夫（G.

7 Timothy Ware, *The Orthodox Church*, new ed. (London: Penguin, 1997), 145–49.

8 Gerald Buss, *The Bear's Hug: Christian Belief and the Soviet State, 1917–1986* (Grand Rapids: Eerdmans, 1987), 27–28.

9 Nathaniel Davis, *A Long Walk to Church: A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Russian Orthodoxy* (Boulder, CO: Westview, 1995), 16.

10 Buss, *The Bear's Hug*, 32–34.

Malenkov) 和布根寧 (N. Bulganin)，成為新的領導人。他手握大權後，馬上對教會進行新一輪的逼迫，大力推行反宗教活動，利用傳媒攻擊宗教，以各種手段關閉教會、修院和神學院，並於1964年迫使教會改變地區行政架構，把權力從神甫轉移至平信徒手中，令教會更容易被關閉。由1958至1966短短數年內，全國教會數目由13,415間，急降至7,466間，減幅達44%；¹¹教牧的數目亦由12,169人，降至6,800人。¹²修院和修士的損失更慘重，由1957年全國的64間修院，降至1965年的18間；¹³修士和修女的人數，也由約4,600人跌至約1,300人。¹⁴至於神學院的學生總人數，在1955年是1,363人，在1964年只得418人。¹⁵

以上只是一些表面數字，顯示情況十分嚴峻。數字的背後隱藏了很多原因，很多故事，很多決定，而俄國人民的宗教性也不能單以數字表達。在逼迫期間，誠然有信徒離開信仰，但亦有很多人走向地下宗教。教會失去的教牧，有的轉而牧養地下教會，有的被判入監獄，繼續他們的信仰服侍。以下讓我們從政府、教會及信徒三方面，看看赫魯曉夫時代，俄羅斯正教的種種現象。

(三) 政府

像蘇聯這樣的獨裁政權，一切重要的決定都是從領導人而來，五、六十年代的逼迫也是出自赫魯曉夫的意思。學者對赫魯曉夫逼迫教會的原因，大致有以下幾種解釋：

11 Davis, *A Long Walk to Church*, 34-44.

12 同上書，頁117。

13 同上書，頁147。

14 同上書，頁157。

15 同上書，頁163-64。

(一) 在其他政治事項上，他一改斯大林那恐怖統治的作風，釋放了不少政治犯，在政治和社會方面較開放。為平衡這方面的行動，並在黨內樹立強人形象，他便要在宗教事務上採取強硬態度，藉此得分。¹⁶ (二) 俄國的年青人在共產主義的薰陶下，傾向追尋理想，¹⁷ 但在斯大林時代，政府對宗教採取容忍態度，使教會力量漸大，為國民提供共產主義以外的另一選擇，威脅了共產主義。¹⁸

(三) 赫魯曉夫嘗試把當時蘇聯的社會主義社會，發展為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。¹⁹ 他曾在演說中揚言蘇聯人民共產社會必會在1980年實現，²⁰ 但他後來發現教會並沒有像共產黨原先所估計的那樣式微，反而有所增長，所以便再用三十年代的高壓手段打壓教會。(四) 在三十年代，國家訓練了一班「無神聯盟工作者」(Bezbozhniki, workers in the Godless League)，在赫魯曉夫時代，他們沒有工作，就以逼迫教會為業。²¹

在上述種種原因下，赫魯曉夫展開對教會的逼迫。可悲的是，他是個十分獨斷獨行、沒有耐性的領導。例如在執政期間，他因要建立政績，不理專家的反對，強行在兩

16 Philip Walters, "A Survey of Soviet Religious Policy," in *Religious Policy in the Soviet Union*, ed. Sabrina Petra Ramet (Cambridge: CUP, 1993), 19.

17 Pospelovsky, *The Russian Church*, 2:351-52.

18 Gerald, *The Bear's Hug*, 43.

19 Walter Sawatsky, *Soviet Evangelicals Since World War II* (Kitchener, ONT: Herald, 1981), 134.

20 Michael Kort, *The Soviet Colossus: History and Aftermath*, 5th ed. (Armonk: M. E. Sharpe, 2001), 278.

21 William C. Fletcher, "Reductive Containment: Soviet Religious Policy," *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* 22, no. 3 (1980): 499.

量不足的地區開發農業，引致失收並損害環境。²²但赫魯曉夫只求數字上的滿足，人民對他來說不過是一堆堆數字；他又經常隨個人喜好，不經諮詢便升貶官員。²³更有評論指他對世界存幼稚的見解，盲目相信自己的思想是優越的。²⁴像這樣的極權領導人要除滅教會，教會所面對的逼迫便可想而知。

赫魯曉夫的宗教迫害，以「嚴謹執行現有法例」為依據。²⁵當時實行的宗教法，是1929年訂立的宗教社團條例（Laws on Religious Associations），此法例直至1990年才被撤銷。主要內容包括：（一）宗教活動局限於十八歲以上的成年人；傳教屬非法行為，教會只可從事禮儀上的活動，不能參與教育、扶貧、醫療等社區服務；每個宗教組織都必須由20個以上的成員組成一個理事會（*dvadtsatka*, a group of twenty）。（二）所有宗教組織都必須向政府註冊。事實卻是政府往往對申請者諸多要求，刻意透過註冊程序來留難和控制教會。²⁶例如一方面要求所有教會必須有神甫，但又不批准神甫調到有需要的牧區，當教會超過六個月也沒有神甫，便大有理由把教會關掉。²⁷（三）所有金錢奉獻必須在教堂內進行。（四）每所教會均由三人組成的核心行政小組掌權，但註冊機關有權撤換任何小組成員。（五）一切宗教聚會必須在教堂建築內進行，在其他地方進行宗教活動，必須事先申請。（六）禁止在公

22 Kort, *The Soviet Colossus*, 265–66.

23 Dmitri Volkogonov, *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*, ed. and trans. Harold Shukman (London: Harper Collins, 1998), 215–18.

24 同上書，頁224。

25 Walters, “A Survey of Soviet Religious Policy,” 20.

26 同上文，頁21。

27 Pospelovskiy, *The Russian Church*, 2:346–47.

眾地方展示宗教物品。(七)教會在註冊時，理事會20個成員的名字都要上報。此舉令很多年輕信徒害怕當註冊教會的會友，理事會因此大都是由年老的姊妹組成，不能有效地代表教會。²⁸(八)政府經常監察宗教活動。(九)政府有權隨時解散任何宗教組織。²⁹另外，政府一度修改曆法，令週日不一定是假期；³⁰此外又曾將1961年的復活節主日定為工作日，³¹阻撓信徒參與主日崇拜。

赫魯曉夫時期的逼迫，比二、三十年代斯大林暴力打壓的逼迫，更為「成熟」，政府往往會利用「專業」人員，加上參考從宗教團體得來的資料，作出部署。³²除了控制教會外，政府又大力宣傳無神論。在五十年代，全國無神論的刊物有40份，總銷路約80萬份，學校內的科目都充斥著無神論的思想。在同一時期，全國只得3份教會刊物，其中銷路最高的，還不到1萬5千份。³³無神論的刊物往往把信徒描繪成傻子，把神職人員抹黑為罪犯、叛徒、酒鬼等。³⁴另外，政府更以「個人工作」令信徒「皈依」無神論，派人作個別信徒的「導師」，誘使信徒放棄基督教，若不成功，便在公眾聚會揪他出來批鬥；再不成功，便以行政手段干擾其工作或學業。³⁵政府逼迫地下教會最

28 Aleksandr Men, "The 1960s Remembered," *Religion, State and Society* 23, no. 2 (1995): 127.

29 Buss, *The Bear's Hug*, 68-72.

30 Walters, "A Survey of Soviet Religious Policy," 13.

31 Nikita Struve, "New Ordeals for the Church in Russia," *St. Vladimir's Seminary Quarterly* 7, no. 4 (1963): 183.

32 Fletcher, "Reductive Containment," 499.

33 Pospelovsky, *The Russian Church*, 2:330.

34 Walters, "A Survey of Soviet Religious Policy," 22.

35 Pospelovsky, *The Russian Church*, 2:331.

有效的方法，要算剝奪基督徒父母對子女的撫養權。這一方面可阻止兒童接觸信仰，另一方面可懲罰把兒女帶到教會的父母，對其他人也起阻嚇作用。³⁶在對付教牧方面，政府將神職人員的稅率大幅提昇至最高83%，無形中令信徒的奉獻有一大部分落入政府的袋中。³⁷此外又迫使教會取消中央資助的制度，所有地區教會必須在經濟上獨立，令貧窮地區的教會難以生存。後來政府發現有教會售賣蠟燭賺錢，便又發起反對蠟燭銷售，同時增加蠟燭稅。當教會付不起沉重的稅款時，政府便「有理由」關閉她。³⁸其他像這樣以行政手段關閉教會的例子，可謂層出不窮：一些教堂被定為歷史古蹟，須收歸國有，並開放給市民享用；一些太接近學校的教會，由於「會影響學校的宗教自由」而被關閉；一些教會因市區重建，須被拆毀；判令一些教會進行維修，同時又阻撓維修物料的供應，以致教會最終不得被關閉；有些神甫被政府扣押多時，不能主持崇拜，政府反指他們牧養的教會數星期沒有崇拜，因而需要關閉。³⁹

為政府執行這些任務的機關是俄羅斯正教事務局（Council for the Affairs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，簡稱CAROC），這機關表面是政府和教會之間的溝通橋樑，實際卻是政府打壓教會的工具，⁴⁰且與祕密警察有緊

36 William C. Fletcher, *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Underground, 1917-1970* (London: OUP, 1971), 228.

37 Struve, "New Ordeals for the Church in Russia," 173.

38 同上文，頁349。

39 Sawatsky, *Soviet Evangelicals Since World War II*, 137-39.

40 Otto Luchterhandt, "The Council for Religious Affairs," in *Religious Policy in the Soviet Union*, 57.

密聯繫。⁴¹前面提及的例子都是CAROC採取主動，介入和控制全國的宗教活動。除了逼迫已註冊的教會外，他們亦打壓地下教會，除滅影響力大的牧者，並且利用教會與國外通消息的渠道，進行誤導、偵察、反宣傳等工作。⁴²

(四) 教會

在這嚴峻的壓力下，教會領導在赫魯曉夫大肆迫害的時期，亦曾嘗試作出反抗，但不甚激烈，因為經過數十年的逼迫，教會領導根本已無力抵抗強權，不像在十月革命後初期，1918年的宗主教⁴³狄康 (Tikhon [Belavin]) 那樣，敢於起來批評共黨，把他們逐出教會。⁴⁴自從1927年宗主教沙基 (Sergii [Stragorodskii]) 宣告向蘇維埃政權稱臣後，教會領導便不再強硬對抗政府。⁴⁵

在逼迫初期，教會領袖最明確的反抗，要算是1960年2月16日，宗主教艾歷時 (Alexis [Simansky]) 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解除軍備會議中演講，回應政府對教會的逼迫。他重申俄羅斯正教在俄國歷史上的重要影響和貢獻，譴責政府對教會的逼迫。艾歷時在講話中引述耶穌的話：「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教會」，分明是衝著政府新一輪的逼迫說的。這令政府甚為不滿，結果逼令撰寫演辭的省區主教⁴⁶尼古拉 (Nikolai [Yarushevich]) 辭職 (尼古拉原是接任宗主教的熱門人選，他這行動毀了他的前途⁴⁷)，

41 同上文，頁61。

42 同上文，頁63-64。

43 即Patriarch。

44 Pospelovsky, *The Russian Church*, 1:38.

45 同上書，頁67。

46 即Metropolitan。

47 Struve, "New Ordeals for the Church in Russia," 180.

又把CAROC的主管卡普夫（G. Karpov）革職。⁴⁸艾歷時受了這「教訓」後學乖了，當新上任的CAROC主管古魯道夫（V. Kuroedov）於同年5月4日「提議」他關閉基輔、史特華路堡（Stravropol）和薩拉托夫（Saratov）的神學院，他便視這為「命令」，在政府尚未正式發出通知之前，就急忙把三間學院關閉。⁴⁹1961年，艾歷時又非常合作地，按政府的意思改革牧區教會⁵⁰，大大削弱了教牧的權力。⁵¹1967年，蘇聯政府成立五十週年，他甚至祝賀政府過去的「成就」。⁵²這些例子顯示軟弱的教會領袖對教會的影響很大。蘇聯政府也深知這道理，當然樂於栽培、晉升一班膽小懦弱的教會領導，對那些有膽反抗的，就一概打壓。

另一例子也顯示政府重用膽小的教會領袖為傀儡。當俄羅斯正教在1961年加入普世基督教會協會（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）時，省區主教尼古疊（Nikodim [Rotov]）代表教會出席在新德里舉行的會議。開會期間，尼古疊對國內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逼迫隻字不提，就像完全沒事兒一樣。⁵³這令外國都以為蘇聯在「開明」的國家領袖赫魯曉夫統治下，宗教變得較以往自由，因而減少了對蘇聯宗教自由狀況的抨擊和施壓，令教會的處境更為不妙。⁵⁴

上文提到1961年的牧區教會改革，內容是把牧區教會

48 Luchterhandt, "The Council for Religious Affairs," 58.

49 Davis, *A Long Walk to Church*, 163.

50 即Parish Church.

51 Pospelovsky, *The Russian Church*, 2:333-36.

52 John Meyendorff, "Humiliated Church," in *Witness to the World* (Crestwood, NY: St. Vladimir's Seminary Press, 1987), 230.

53 Buss, *The Bear's Hug*, 50.

54 Walters, "A Survey of Soviet Religious Policy," 23.

的權力，由神甫轉移到由三個平信徒組成的行政小組，小組的成員必須經政府核准，而神甫也就無權參與教會的行政和經濟決策，只剩下禮儀的事務可做。⁵⁵這改革方案在教會會議中獲得通過，也是以卑劣的手段達到的。當時宗主教艾歷時召集眾主教開會，事前無人知道有這改革提案。經過一天冗長的禮拜和晚餐後，眾人被帶到會議室，艾歷時才突然把提案宣讀出來，並申明他並不預期會有異議，只期望達到一致共識。而就在主教們「私下」討論時，有三個政府官員公然坐在旁邊監聽，像是告訴他們：誰反對，誰便要有「秋後算賬」的心理準備。不出策劃者所料，改革提案也就順利通過了。⁵⁶看來艾歷時在短短的日子，已學懂以政府慣用的政治手段控制主教們。

當這牧區教會的改革在地區實行時，地方教會的神甫竟也大部分接受了改革。有學者認為這是由於那時的神甫都是在蘇聯統治下成長，在革命前成長的牧者大都已經去世。這一代的人，在心態上已完全接受了政府的極權統治，根本不知道在教會和社會可以同時有兩套律例，管理不同層面的事。他們看教會只是敬拜、祈禱的地方，沒有獨立的司法系統。所以當政府的指令來到時，大部分神甫都沒有反抗。⁵⁷當然也有些神職人員不堪逼迫和引誘，離開了教會，如烈寧格勒神學院 (Leningrad Theological Seminary) 的奧士葡夫 (A. Osipov) 教授，以及薩拉托夫神學院 (Saratov Seminary) 的年輕講師杜路漫 (E. Duluman)。後者甚至投身政府，轉而宣傳無神論。⁵⁸

55 Pospelovsky, *The Russian Church*, 2:336.

56 同上書，頁336-39。

57 同上書，頁327-29。

58 同上書，頁332。

然而，在地區牧者中，也有堅守信念的。像郭慕勤（Germogen）主教，在赫魯曉夫的迫害時期中，他一步也沒退讓。其間政府不斷引誘他，說只要他關閉一間教會，便可獲晉升，但他堅持不妥協。最後，在他管轄下的牧區，沒有一間教會被關閉，可是他的堅持也換來了被辭退的命運。⁵⁹ 二十世紀著名的俄羅斯正教作家文力山（Alexander Men），在赫魯曉夫開始逼迫教會時，剛被按立為神甫。在地區事奉時，他招聚了一群神職人員討論牧養的困難，眾人都深深感到教會中央不斷牽制著他們的地區工作，覺得沒有主教更好。文力山發覺這問題需要解決，便邀請郭慕勤主教加入討論。這小組漸漸演化為1965年，一群地區神甫寫公開信給宗主教艾歷時的歷史事件。⁶⁰ 信中指政府關閉教會和修院，是干預了教會內部的事務，有違蘇聯「政教分離」的政策，所以他們請艾歷時要求政府停止關閉教會，並歸還沒收了的教會產業。⁶¹ 在這神甫小組中，原本有11人計劃簽署公開信，但最後只有兩位神甫耶近寧（G. Yakunin）及英利文（N. Eshliman）簽署了，其他人都因害怕家人受累，沒有簽署。⁶² 而耶近寧和英利文亦果然很快便被艾歷時革了職。這事件顯示在教會內仍有一些有良心、有勇氣的人，但軟弱的教會領袖不僅沒有與主內肢體聯手對抗逼迫，而且無須政府出手，便已先行

59 Men, "The 1960s Remembered," 125.

60 同上文，頁130。

61 N. I. Eshliman and G. P. Yakunin, "Appeals for Religious Freedom in Russia: Document 1," *St. Vladimir's Seminary Quarterly* 10, nos. 1-2 (1966): 76.

62 Michael Bourdeaux, *Risen Indeed: Lessons in Faith from the USSR* (Crestwood, NY: St. Vladimir's Seminary Press, 1983), 20.

「處理」了敢於反抗的人。

除了這些積極的回應外，地區教牧也對逼迫作出一些較隱蔽的回應。當政府逼迫得厲害時，神甫會替信徒舉行一些「缺席」禮儀，如為去世的信徒祕密以空棺補行喪禮；在新郎新娘寄來的信物前，替他們「缺席」舉行婚禮；以郵寄方式告解，又或在私人地方祕密為人禱告等等。⁶³也有不少教牧走進地下教會服侍；⁶⁴被判入監獄或勞改營，在裏面繼續事奉的，亦不乏人。⁶⁵

(五) 信徒

隨著教會數目銳減，可以參與崇拜的信徒也減少。但逼迫帶給平信徒的轉變，很難以數目代表，因為一方面並沒有信徒到教會聚會的準確統計數字，另一方面，信徒的屬靈狀況也不能簡單地以有沒有到教會去釐定。可以肯定的是，逼迫必定會令一部分信徒放棄信仰，這從教牧也有背道的例子便可估計到。但在五、六十年代的逼迫中，卻有不少信徒積極持守信仰的例子。法國人艾查連諾夫 (Elchaninoff) 曾於1961年夏天居於莫斯科，他便觀察到信徒雖然很害怕，但對信仰仍然充滿熱誠，在街上也看到有警察把小十字架藏在制服下。艾查連諾夫又認識了幾位信徒，包括經常到教會的女傭、雖然沒有到教會但會對著聖像祈禱的女教師，以及深諳基督教著作的化學工程師。只是到教會聚會的，大部分是年長的姊妹，因為她們沒有甚

63 Pospelovsky, *The Russian Church*, 2:357.

64 Vladimir Moss, "The True Orthodox Church of Russia," *Religion in Communist Lands* 19, nos. 3-4 (1991): 239.

65 Fletcher, *Russian Orthodox Church Underground*, 130.

麼牽掛，也不害怕失去些甚麼。⁶⁶

其實在五、六十年代的蘇聯，有不少人重新對信仰產生興趣。據六十年代在蘇聯協助教會的英國牧師鮑德安（M. Bourdeaux）所述，有一位年青人保里殊（Poresh）就是在尋求生命意義的過程中，在沒有旁人指導下，得出神確實是存在的結論，結果成為了基督徒。⁶⁷ 告斯羅夫（Kozlov）因犯法被判入獄，在獄中意識到從小接受的無神思想是毀滅靈魂的，結果在獄中成了基督徒，出獄後因基督徒的身分受逼迫，後來更因而再度入獄。⁶⁸ 有學者指出，赫魯曉夫在政治社會上較斯大林開放，令人們重新對以往不准提及的事物產生興趣，包括宗教。從六十年代開始，一些年青知識分子在家中談天說地的範圍，亦包括信仰和神學。在七、八十年代活躍於教會圈子的柏上軒（Y. Pazukhin），便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成為基督徒的。⁶⁹ 另一方面，政府拆毀教堂，引起民眾關注保護歷史文物，反倒令年輕人渴望了解自己的文化傳統以至宗教信仰，而處於反叛階段的年青人，也愛挑戰上一代無神論的思想。種種因素都令較年輕的一代對教會產生興趣。⁷⁰ 政府官員也得承認，宗教並未被多年來的壓力和無神論宣傳消滅。1962年，一篇刊登在反宗教刊物《科學與宗教》（*Science and Religion*）的文章，宣傳無神論的作者亦不諱言在很

66 Cyril A. Elchaninoff, "Does Religion Still Exist in the USSR?" *St. Vladimir's Seminary Quarterly* 5, no. 4 (1961): 46-48.

67 Bourdeaux, *Risen Indeed*, 34.

68 同上書，頁91-94。

69 Yevgeni Pazukhin, "Charting the Russian Religious Renaissance," *Religion, State and Society* 23, no. 1 (1995): 57-58.

70 James H. Billington, "Christianity in the USSR," *Theology Today* 37, no. 2 (July 1980): 202-4.

多地區，宗教的「遺跡」仍然存在。⁷¹

在逼迫的日子，很多信徒是願意站起來的。1964年，當政府要拆毀莫斯科的彼得保羅大教堂（Peter-and-Paul's Cathedral）時，一群信徒圍著教堂，嘗試阻止軍人入內。儘管教堂最終還是被炸毀了。⁷²1959年起，政府試圖關閉在烏克蘭西部的波奇輔修院，後來因信徒努力把消息傳到國外，外國向蘇聯政府施壓，修院才得以保存。⁷³

一般來說，平信徒的行動並不激烈。在基督教的節日曾發生過暴動，但生事者都是一些企圖破壞教堂的滋事分子。六十年代的逼迫所引發的信徒抗議行動，主要是想表達出：政府逼迫教會是干預了教會的內政。⁷⁴這些抗議行動，就算在緊張的情況下，仍保持良好秩序。⁷⁵有學者指出，信徒群眾的力量其實比教會領袖更能影響政府的決策；軟弱的教會領袖令政府變本加厲地逼迫教會，只因信徒起而抗爭，政府才最終停止了逼迫。⁷⁶這樣的結論可能高估了平信徒的影響力，但民眾的力量畢竟是不容輕視的。

信徒面對逼迫和令人失望的教會領袖，另一種回應是加入地下教會。早在二十年代當宗主教沙基向共產政權稱臣時，地下教會已開始活躍。⁷⁷在赫魯曉夫的年代，更多

71 A. Veschikov, "Milestones of a Great Journey," *St. Vladimir's Seminary Quarterly* 6, no. 4 (1962): 207.

72 Bourdeaux, *Risen Indeed*, 7.

73 Davis, *A Long Walk to Church*, 147.

74 Fletcher, "Reductive Containment," 500–501.

75 Vladimir A. Kozlov, *Mass Uprisings in the USSR: Protest and Rebellion in the Post-Stalin Years*, trans. and ed. Elaine McClarnand MacKinnon (Armonk: M. E. Sharpe, 2002), 164.

76 同上書，頁166–69。

77 Pospelovsky, *The Russian Church*, 2:365.

人走入地下教會，⁷⁸ 他們大都對官方承認的教會相當敵視。蘇聯初期最大的地下教會是「真正統信仰教會」(True Orthodox Church)，他們有組織架構，嘗試「複製」官方承認的教會。但隨著時間流逝，神甫漸漸老去，逼迫又重，他們越來越難生存。在1950-51年間，他們的活躍人物被捕，活動亦隨之式微。⁷⁹ 繼之興起的是「真正統信仰基督徒」(True Orthodox Christians)，他們的組織較靈活，似運動多於教會組織；每間「教會」由10至15人組成，在家中聚會。其中有些信徒傾向與社會隔離，免得被「敵基督」——政府所代表的世界——污染；一些思想極端的，甚至把政府供應的水電都切斷。⁸⁰ 在赫魯曉夫逼迫的時期，有些信徒變得更為極端，嚴守緘默，與世隔絕。「真正統信仰基督徒流浪者」(True Orthodox Christian Wanderers) 甚至連居所也放棄，四處流浪。⁸¹ 這樣看來，就像一般地下教會那樣，蘇聯的地下教會也有漸趨極端的教派，甚至有形成異端的傾向。事實上，對地下教會來說，生存是最關鍵的問題，教義是否純正已不是最重要的事了。⁸² 其實宗派間的分歧，在困難的環境中是會淡化的，例如在蘇聯的監獄或集中營內，來自官方教會或地下教會的牧者也好，來自正教或浸信會的信徒也好，大家都已不分彼此，一同分享信仰。獄中信徒的比例特別高，某些集中營內，有五分之一是神甫，一半是正教信徒。⁸³ 監獄於是成了逼迫時期的「神學院」，預備信徒獲釋後繼續

78 同上書，頁372。

79 Fletcher, *Russian Orthodox Church Underground*, 180-86.

80 同上書，頁199-228。

81 同上書，頁231-35。

82 Wurmbrand, *The Soviet Saints*, 40.

83 Fletcher, *Russian Orthodox Church Underground*, 130.

事奉。⁸⁴

有學者認為地下教會的存在，對蘇聯政府的宗教政策有很大影響。事實上，共產黨不完全鏟除宗教，也是由於有地下教會之故。註冊教會雖然是共產黨的眼中釘，他們始終是在明處，可被監察和控制；若是鏟除所有官方教會的話，信徒會被逼走進地下教會，到時便得靠祕密警察來打壓，極費人力物力。共產政權一直沒有鏟除官方教會，就是由於有這點顧慮。⁸⁵

（六）反省

赫魯曉夫倒台後，在布里滋涅夫 (L. Brezhnev) 長達近二十年的統治中 (1964-84)，政教關係處於膠著狀態，沒有嚴峻的逼迫，但政府仍不許建立新教會，教會和教牧人數維持在低水平。布里滋涅夫去世所引發的政治浪潮，導致1991年蘇聯共產政權解體，宗教迫害亦在八十年代末解除。俄羅斯正教再一次光明正大地，成為俄國最大的宗派。⁸⁶

赫魯曉夫時代的教會歷史，可以帶給我們一些反省。首先是教會領袖應如何面對宗教迫害。理論上，基督徒面對逼迫，最正確的回應是堅守信念，但實際的處境往往不是這樣簡單。十月革命後不久，俄國正教的領袖仍有膽量批評政府，但在接踵而來的逼迫底下，隨著時間流逝，人事的轉換令教會漸漸變得軟弱，而長期在鎗口的威脅之下過活，再堅強的信徒也可能會屈服下來。宗主教艾歷時對政府的順服便是一個例子。在逼迫下的教會，究竟應與政

84 同上書，頁128。

85 同上書，頁3。

86 Davis, *A Long Walk to Church*, 46-93.

權對抗到底，即使玉石俱焚也在所不惜，還是應委曲求存，靜待逼迫的日子過去？⁸⁷

這問題也許沒有肯定的答案，然而值得深思的是，正教領袖在赫魯曉夫的逼迫下，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否完全值得原諒？有學者比較了三個在共產政權下的教會，即波蘭天主教、東德路德會和俄羅斯正教，發覺波蘭的天主教一直公然對抗政府，東德的路德會不斷和政府膠著地拉鋸，俄羅斯的正教教會卻有些時候非常支持政府。⁸⁸誠然，波蘭和東德被共產政權統治的日子較短，波蘭天主教又有梵蒂岡和普世天主教支持，與政府抗爭比較容易，但俄羅斯正教的領袖，畢竟是被波蘭和東德教會的領袖比了下去。學者嘗試解釋其中的原因：俄羅斯正教早在十八世紀已接受政府的管治，只因當時的沙皇也信奉基督，所以教會沒有受逼迫，而教會由於長期受政府統治，早已習慣了服從政權。此外，俄羅斯正教著重禮儀，不重宣教或神學。⁸⁹在逼迫期間，教會不能宣教，且要在神學上作出妥協，但禮儀卻可在某程度上維持不變，因此著重禮儀過於宣教和神學的俄羅斯正教，仍可以在這環境下委曲求存。二次世界大戰時，曾被德軍短暫佔領的蘇聯地區經歷到宗教復興，但當時的納粹政權卻在德國本土被潘霍華猛烈抨擊；蘇聯地區的信徒視納粹佔領時期為恢復宗教活動的契機，顧不了這政權有否違反基督教原則，但德國的信徒卻抓緊

87 Hieromonk Hilarion (Alfeev), "Orthodox Theology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21st Century: Will There Be a Renaissance of Russian Theological Scholarship?" trans. Peter Bouteneff, *Ecumenical Review* 52, no. 3 (July 2000): 312.

88 Jeff Haynes, *Religion in Global Politics* (London: Longman, 1998), 92.

89 同上書，頁98-99。

信仰原則，與納粹政權對抗，這反映俄國教會在蘇聯的統治下宗教自由的限制。要是潘霍華生在俄國，可能已成為俄國信徒所傳頌的正教鬥士及殉道者。那麼問題是：為何俄羅斯的正教未能培養出像潘霍華這樣的基督徒？這會否和他們在傳統上不大注重神學反省有關？正教的歷史提醒我們：教會應奉行政教分離，保持教會的獨立，甚至在政權是信奉基督的國家也應如此；教會必須注重宣教和神學研究，並要與外地及其他宗派的教會建立良好的聯繫。這樣，當逼迫來到，抵禦的力量也許會更大。

這段蘇俄歷史也告訴我們不要輕看民眾的力量。就算是蘇共的極權政權，也會因平民的行動和地下教會的存在而調整他們的決策。此外，蘇聯的歷史也顯示人類的宗教性是不能完全遏制的。即使那些在無神論的教育底下成長，一生沒有接觸過信仰的人，也會追尋生命的意義，甚至意識到神的存在。在沒有宗教自由的地方，若法律不容許直接宣揚基督，那麼挑起人心中存有的宗教意識，或許是傳福音有效的切入點。

在大部分迫害教會的國家，官方和地下教會都同時存在，而地下教會大都敵視官方教會。官方教會誠然有缺乏骨氣的問題，地下教會卻往往容易產生異端。其實她們都是由罪人組成，各有自己的問題，問題又各有其歷史成因。蘇聯監獄中基督徒合一的現象，讓我們看到當外來的壓迫越嚴重，信徒的分歧也越少，說到底大家都是基督內的弟兄姊妹。若國家同時存在官方和地下教會，雙方都應該抱開放的態度，了解對方的歷史。不應妄下評語，互相指責，關閉溝通合一之門。當逼迫教會的政權仍在位時，官方教會就算如何「聽話」，也不應協助政府殘害地下教會，因後者面對的困難更大，而她們的存在，很可能正是政府不鏟除官方教會的原因。地下教會也不應過激地反對

官方教會，因為官方教會往往是地下教會的「祖宗」，且能為那些不願冒險加入地下教會的信徒提供多一條出路。

（七）總結

文力山神甫在評論共產黨的逼迫時說：

難道你認為是無神論者破壞我們的教會？真正破壞教會的，是那些假信徒——商人、貴族、有權有位的人。他們用欺壓得來的放蕩作樂，死時以金錢從教會得到赦罪。我們的教牧也犯了罪：勾結權貴，祝福他們的惡行。那些無神論者只是來彰顯神的忿怒。我們所種的，我們自己收取。⁹⁰

他認為歷時七十年的共產黨逼迫，是神對教會從前犯下的罪之懲罰。這觀點不能從歷史角度證明，但在歷史的反照下，卻能給所有時代、所有地方教會有血有肉的提醒。二十世紀初的俄羅斯正教，絕對想不到未來大半個世紀的歷史會是這樣的；世事真的難料。也許當時他們確實未能讓俄國人民在共產主義以外，找到另一滿意的出路，以致共黨可乘機專權，並帶來其後七十年的逼迫。在自由社會的教會，包括以基督教為國教的教會，實在不應以為宗教自由是必然的。當教會仍享自由時，必須把握機會，跟從基督的吩咐，傳揚福音，教育信徒，回應社會，作基督忠心的僕人。

90 Elizabeth Roberts and Ann Shukman, eds., *The Life and Work of Alexander Men* (London: SCM, 1996), 107.